胡適與梁啟超

——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和與排拒

張 朋 園

(一)

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與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分別是戊戌維新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袖之一，兩人相差十八歲。歷史上如果沒有這兩位人物的出現，是否這兩個運動會那麼有聲有色，或甚至於會發生，則是令人懷疑的事。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因爲梁啟超的一隻「常帶感情」之筆，清末科舉制度的廢止，立憲運動的昇起，甚至於辛亥革命的爆發，都與他有十分密切的關係。而胡適也是一樣。他提倡白話文，躬體力行，傳播實驗主義，主張思想解放，民主科學，全盤西化，在全國人的心目中發生了無限的威力。綜合言之，梁胡是中國傳統思想的解放者，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各有其崇高的地位。

俗語說，英雄人物不世出，五百年難得一見；清末民初有梁啟超與胡適的出現，可謂難得；也因此才使得短短不足三十年間（一八九五～一九二一）中國的知識界，政治局面有了巨大的變遷。但這是一種命定論。梁胡的出現和他們劃時代的言論都有其歷史背景及先後傳承的關係。著者曾經著文討論人物對人物的影響，指出思想的承先啟後是造成時代變遷的主要動力①。最近稍涉胡適的史料，發現他與梁啟超之間有許多往還，尤其是他們的思想中交流而相互影響，甚至於政治上有結合的試探。凡此種種值得加以敍述和討論。本文觀察胡適早年受梁啟超言論的影響，胡梁在學術上的往還，胡梁的政治見解與接觸，胡梁之間的情誼等。這幾方面的關係，自然顯示著一定的意義。

(二)

梁啟超對清末新興知識分子都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幾乎沒有例外，胡適就是一

① 張朋園，「黃遵憲的政治思想及其對梁啟超的影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一期（民五八年），頁二一七～二三七。

很好的例子。胡氏在十五歲的時候，便讀到梁的著作。論清末的文字影響力，有兩個人最為重要：一是嚴復，一是梁啟超。但胡適將兩人作一比較，認為嚴不如梁。胡回憶他在上海澄衷學堂（一九〇五～一九〇六）看了一些課外書籍，有嚴復的「羣己權界論」，有梁啟超的「新民說」。胡謂：「嚴先生的文學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響沒有梁啟超的影響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②梁啟超在胡適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喜愛梁的文字，遍讀梁的著作，謂梁的文字對他是「無窮的恩惠」。他在「四十自述」中回想梁對他影響的兩種著作，「第一是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的大勢』，」前者使胡認識了民族主義的意義，後者奠定了他治學的方向。胡謂：「『新民』的意義是要改造中國的民族，要把這老大的民族改造成一個新鮮活潑的民族。」胡適大段引述梁啟超的警語，同時發抒自己的感受：

「〔梁啟超說〕：『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新民說敍論）

「他〔梁氏〕的根本主張是：『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中國羣治；現象殆無一不當從根柢處摧陷廓清，除舊而布新者也。』（新民議）

「說的更沈痛一點：『然則救危亡求進步之道將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使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藉，然後能滌盪腸胃以上於進步之途也！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清而辭闢之，使數百年如蠹魚如鸚武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毋得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為民賊之後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無血之破壞，二曰有血之破壞。……中國如何為無血之破壞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國如不得不為有血之破壞乎？吾衰絰而哀之。』（新民說論進步）我們在那個時代讀這樣的文字，沒有一個人不受他的震盪感動的。他在那時（一九〇二～一九〇三）主張最激烈，態度最鮮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很明白的提出一個革命的口號：『破壞亦破壞，不破壓亦破壞。』後來他雖然不堅持這個態度了，而許多少年人衝上前去，可不肯縮回來了。

② 胡適，四十自述（臺北，遠東，民六一年），頁五一七。他同時又說：「這時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勢力的時代。他雖不曾明白提倡種族革命，却在一班少年人的腦海裏種下了不少革命種子。」（同上，頁五三）

「新民說的最大貢獻在於指出中國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許多美態，梁先生很不客氣說：『五色人相比較，白人最優。以白人相比較，條頓人最優。以條頓人相比較，盎格魯撒克遜人最優。』他指出我們所最缺乏而須採補的是公德，是國家思想，是進取冒險，是權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進步，是自尊，是合羣，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義務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這十幾篇文字裏，抱著滿腔的血誠，懷著無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筆鋒常帶感情』的健筆，指揮那無數的歷史例證，組織那些使人鼓舞，使人掉淚，使人感激奮發的文章。其中如論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後重讀，還感覺到他的魔力。何況在我十幾歲最容易受感動的時期呢？

「新民說諸篇給我開闢三個新世界，使我徹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③

以上是胡適追記梁啟超給他的民族主義啟示。

梁啟超對胡適治學方法的影響，胡氏自己也說得很清楚，他後來寫中國哲學史，是得了梁的啟示。他說：

「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梁先生分中國學術思想史為七個時代：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三、儒學統一時代，兩漢；四、老學時代，魏晉；五、佛學時代，南北朝、唐；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七、衰落時代，近二百五十年。我們現在看這個分段，也許不能滿意，（梁先生自己後來也不滿意，他在清代學術概論裏已不認近二百五十年為衰落時代了）但在二十五年前，這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的見解。所以我最愛讀這篇文章。不幸梁先生做了幾章之後，忽然停止了，使我大失望。甲辰（一九〇四）以後，我在新民叢報上見他續作此篇，我高興極了。但我讀了這篇長文，終感覺不少的失望。第一，他論全盛時代，說了幾萬字的緒論，卻把本論全擱下了，只註了一個『闕』字。他後來只補作了『子墨子學說』一篇，其餘各家始終沒有補。第二，佛學時代二章的本論一節也完全沒有做。第三、他把第六個時代（宋元明）整個擱起不提。這一部學術思想史中間闕了三個最要緊的部

③ 胡適，四十自述，頁五七～五九。

分，使我眼巴巴的望了幾年。我在那失望的時期，自己忽發野心，心想『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闕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我越想越高興，雖然不敢告訴人，卻眞打定做這件事了。這一點野心就是我後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④

胡適回憶個人受梁啟超的影響如此淸淸楚楚。胡氏很早就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可惜他在上海時期的藏暉室日記，幾乎已經完全散佚⑤，無從了解他在出國前如何記載梁啟超。但是在他的留學日記中，梁啟超出現的頻率很高。每有所記，都是以非常同情的立場處之。一九一一年六月廿八日他第一次記載梁氏，是因爲梁受上海革命黨報紙的攻擊，梁在「國風報」中加以答辯。胡在日記上說：「閱國風報，見梁卓如致上海各報館書，心頗韙其言，以爲上海各報對梁氏誠有失忝甚之處，至於辱及妻女，則尤可鄙矣。」⑥

辛亥革命之後，梁啟超結束流亡生涯歸國，胡適記載此事，並有所發抒：「閱時報，知梁任公歸國，京津人士都歡迎之，讀之深歎公道之尙在人心也。梁任公爲吾國革命第一大的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⑦胡適推崇梁氏對革命有貢獻。

民國五年六月，袁世凱的死訊傳到美國，胡適想起十餘年前袁氏使維新變法功敗垂成，大大痛責袁氏：

「使戊戌變法不致推翻，則二十年之新政，或已致中國於富強，卽不能至此，亦決無庚子之奇辱，可無疑也。袁氏之賣康梁，其罪眞不可勝誅矣！二十年來之精神財力人力，都消耗於互相打消之內訌，皆戊戌之失敗有以致之也。」⑧

胡氏對戊戌變法寄予同情，因而將民國的治理亦寄託在梁啟超等人的身上，民國五年七月十七日的日記說：

④ 同上，頁五九～六一。
⑤ 根據香港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出版「胡適的日記」，藏暉室日記僅得一九一〇年二月四日至三月二三日部份，爲時僅二月。
⑥ 胡適留學日記（臺北，臺灣商務，民六九年），頁五二～五三。
⑦ 胡適留學日記，頁一二二。
⑧ 胡適留學日記，頁九二六。

「人問今日國事大事如何？答曰，很有希望。因此次革命〔指護國之役〕的中堅人物，不在激烈派，而在穩健派，即從前的守舊派。……我國今日的現狀，頑固官僚派和極端激烈派同時失敗，所靠者全在穩健派的人物。這班人的守舊思想都爲兩派的極端主義所掃除，遂由守舊變爲穩健的進取。況且極端兩派人的名譽（新如黃興，舊如袁世凱）皆已失社會的信用，獨有這班穩健的人物如梁啟超、張謇之流名譽尙好，人心所歸，有此中堅，將其勢力擴充，大有可爲。」⑨

這一段文字顯示胡適對梁啟超一輩溫和型的人物甚有好感。他甚至於無條件的接受梁啟超的政治見解。例如民國四年五月他讀到梁的「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一文，稱道「其言甚與吾意相合，」因而在日記中大段節引梁的觀點。梁氏這篇文章的大意，認爲政治的基礎，有其必要的八個條件：

「㈠有少數能任政務官或政黨首領之人，其器量、學識、才能、譽望皆優越而爲國人所矜式；㈡有次多數能任事務官之人，分門別類，各有專長，執行一政，決無隕越；㈢有大多數能聽受政譚之人，對於政策之適否，略能了解而親切有味；㈣爲政治活動者皆有相當之恒產，不至借政治爲衣食之資；㈤凡爲政治運動者，皆爲水平線上之道德，不至擲棄其良心之主張而無所措；㈥養成一種政治習慣，使卑污闒冗之人，不能自存於政治社會；㈦有特別勢力，行動軼出常軌外者，政治家之力能抗壓矯正之；㈧政治社會以外之人人，各有其相當之實力，既能爲政治家之後援，亦能使之嚴憚。」⑩

梁氏的中心思想是精英主義。胡適接受他的說法，認爲「此文甚哀，宜有所收效。」⑪

胡適在留學日記中提到梁啟超的地方尙多，在此不必一一引述。從以上各點，可以看出梁啟超在胡適的心目中是個英雄人物，他接受梁的政治見解，注意梁的一舉一動。民國以後兩個人的境遇完全不同。梁啟超欲展「國務大臣」的志氣，但在政壇上並不得意。而胡適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他的文學改革主張使其成爲五四運動中的風雲人物。胡梁十八歲的差距，可以說是兩代人物，民國時期兩人遭遇不同，一沈一昇，頗有長江後浪推前浪之勢。胡梁在北京因爲學術上的需

⑨ 胡適留學日記，頁九五九～九六〇。
⑩ 梁啟超，「政治家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大中華（上海，民四年），第二號。
⑪ 胡適留學日記，頁六五三。

要而結識，在社交場合中多所往還，甚至還試圖在政治上有所溝通，可以說都是一時的政治精英。唯他們的接觸是否投契，是否導至一共同的行動，或者他們本來就有年齡上的代溝，再由於時間的推移，他們的政治見解已經有了不同，下文將進一步加以觀察和討論。

(三)

民國七年十一月間，胡適經由銀行家徐新六（振飛）的介紹而與梁啟超認識⑫。這時候的梁啟超已經從政壇上退了下來，隱居天津著述。胡適經過徐新六的介紹之後，給梁啟超寫了一封信：

「任公先生有道：秋初晤徐振飛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學頗蒙先生嘉許，徐先生並言先生有墨學材料甚多，願出以見示。適近作墨辯新詁，尚未脫稿，極思一見先生所集材料，惟彼時適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書左右，近聞貴恙已愈，又時於國民公報中奉讀大著，知先生近來已復理文字舊業，適後日（原注：十一月二十二日）將來天津南開學校演說，擬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機會趨謁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懷，一以便面承先生關於墨學之教誨，倘蒙賜觀所集墨學材料，尤所感謝。適亦知先生近為歐戰和議問題操心，或未必有餘暇接見生客，故乞振飛先生為之紹介，擬於廿三日（原注：星期六）上午十一時趨訪先生，作二十分鐘之談話，不知先生能許之否？適到津後，當再以電話達尊宅，取進止。」⑬

從這些信看，胡頗執弟子禮，對梁極為恭敬，自此，他們展開十餘年之交往。

民國七年時的胡適，因為年前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等文章，轟動一時，引起了全國性的討論，這也就是所謂中國文學革命的開始。他的名氣不逕而走，成為一個站在時代尖端的人物。他同時又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受到時人崇高的尊敬。北大是中國當時的第一所學府，中國知識界的精英多半集中在此，形成了知識分子的大本營，民國八年五四運動掀起，北京大學是站在領導的地位。此一雙重關係，使得胡適的地位迅速上昇。北京大學的知識分子無形中形成了一個有勢力的集團，他們的發言受到各方重視。北大教授們也有知識分子當仁不讓的氣概，對匡輔時局也有義不容辭的感受，不僅熱烈討論時政，更試圖有所組織，必要時可以

⑫ 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臺北，世界，民四七年），頁五五〇～五五一。原信說：「胡適之先生現任北京大學掌教，主撰新青年雜誌，其文章學問久為鈞座所知，茲有津門之行頗擬造謁，敢書一言，以當紹介。」

⑬ 同前，頁五五一。

採取行動。這是一個很自然的趨勢，對於胡適地位的躍昇也有很大的幫助。

五四運動並不是一個有組織的行動，單打獨鬪發生不了多大的力量。或許這一次的經驗刺激了北大教授們感到有結合的必要。但知識分子觀點的分歧，無論古今中外，幾乎沒有例外，要組合是十分不易的。所以北大並沒有直接發展出近於政黨的組織。但是退而求其次，大家在一起談談總是可以的，一個談話會的形式終於出現了。

談話會的發軔大約在民國十年。目前可根據的材料是胡適的日記，但由於胡適日記殘缺不整⑭，我們只知道十年五月廿一日胡氏首次提及他和王徵、丁文江、蔣夢麟聚談，決定組織一個小會，胡適起草一個組織大綱，但內容如何，胡適並沒有記下⑮，六月六日，胡適又說在任鴻雋家與丁文江、王徵等再談組會的事⑯，不知何故，一直拖著未能實現。但北京是個人文薈萃的地方，非正式的聚會很多。聚在一起就談國家大事，極屬平常。在這些場合中，胡適經常被邀參加。民國十一年五月廿一日的一次聚會，胡適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記中說，那天是王寵惠邀在法學會吃飯，在座的有蔡元培、羅文幹、梁啟超、林長民、熊希齡、董康、顏惠慶、周自齊、張耀曾等一時名流，新舊雜揉。胡適說：「今天的會，本意是要把各黨派的人聚會來談談，大家打破從前的成見，求一個可以共同進行的方向。今天結果雖少，但他們談過去的政事，到也開誠認錯。」⑰這幾句話點出了組會的本意是要大家有機會溝通，可以找到「共同進行的方向」。

正式發起的是一種談話會，發起人是蔡元培、王寵惠、顧維鈞、羅文幹等人。據胡適的日記，十一年六月廿日這天，蔡元培等「邀了二十多位歐美同學在顏〔惠慶〕宅談話，討論今日迫切問題。」有丁文江、張嘉森、周詒春、蔣方震、林長民、陶孟和、李石曾、高魯、葉叔衡等一班名流⑱。胡適覺得這個意思很好，」以後可以定期開會，「每次由四五個人作主，」不會中斷。因此他與羅文幹提議，立

⑭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有一套胡適日記微捲，計包括民國一〇、一一、一四、一七、一八、一九、二〇、二二、二三、二四各年日記，殘缺甚多。最近香港中華書局所出版「胡適的日記」二册，僅有一〇、一一年較完整。

⑮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頁六二。

⑯ 同上，頁八七。

⑰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頁五三七。胡適還說了幾句人物論評的話：「這些人之中，顏駿人最陋，人却不壞，周子廙自然是很深沉的政客。但我不解他何以很恭維徐菊人（世昌），說他是個「哲學大家」，勤而能計慮！董授經是很老實的人，極力答應實行財政公開的主張（因爲他近有財政總長之望，已定了）但我怕他太老實了，幹不下這樣一件大事」，（見同上）。

⑱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頁三八三。

即得到大家通過。胡適、張嘉森、高魯等是第二次談話會的主人⑲。開會日期是六月廿七日，借用顧維鈞家為會場，到會的人比上次還要多。王世杰提出中國當實行邦聯制 (Confederation) 的說法，謂之為「分治的統一」，胡適不以為然，與之爭論，甚為熱烈。第三次談話會於十一年七月十四日舉行，主人是顧維鈞、王寵惠等人。胡適說這次談話的內容以聯省自治為重心⑳。

從三次談話會的形式和內容看，沒有黨派的關係，卻有一些學術性的氣氛。但梁派的人物頗有意拉攏北大人物，組織一個新政黨。梁啟超等於民國二年組織進步黨，不久國會被袁世凱解散，進步黨無形中停頓。民國六年國會重開，進步黨以憲政研究會的姿態出現，人稱研究系。然而民國七年的新國會為安福系所把持，梁啟超等被逼退出政壇，傳統的立憲派自此失勢。然而梁啟超、林長民等方當壯盛之年，並不甘心就此退隱。梁氏民國九年歐遊歸來，雄心再起，想要重新組黨，從辦學講學方式著手，計畫培植和拉攏新興的知識分子，再組一個有實力的政黨㉑。梁啟超、林長民的注意力集中在北大的一批知識分子。自從民國七年梁與胡適結識，研究系人物便與北大人物開始接近，教育與學術的接觸最多。例如民國九年以後之邀請西方學者來華講學，羅素、杜威、泰戈爾等的訪問中國，便是梁派的共學社與北大學界共同發起的㉒。雙方的往還時間愈久，愈為密切，林長民終於提出了組黨的意見。

民國十年前後的政局，最使人心焦不安的是軍閥政治，關心時局的知識分子，試圖尋找一個解決的辦法。大家認為軍閥為禍，主要是他們有軍隊和槍桿子。民國元年時，全國軍隊不過五十萬人，以後各自擴張，民國七年時已超過了一百萬人，民國十三年時已超過了一百五十萬人。如果能將這些軍隊裁去，軍閥便就失了憑藉。當時想到的辦法是聯邦自治及裁兵兩個辦法。希望各省實行自治，控制預算，軍閥拿不到錢，軍隊便不得不縮減。這是一種天眞的想法，以為有了省憲，實行自治，便可控制財政。豈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軍閥那會束手就擒。他們反過來利用自治運動，固守自己的地盤，在自己的地盤內為所欲為，省憲對他們一無拘束力㉓。然而一般知識分子以為找到了解決軍閥為害的無上策略，一面支持省憲運

⑲ 同上，丁編，梁譜，頁六一八。
⑳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頁四〇三。
㉑ 詳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第三、六章。
㉒ 同上。
㉓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臺北，臺灣商務，民四六年），頁五四四～五四七。

動，一面大倡裁兵主張，轟轟烈烈，熱鬧非常㉔。

梁啟超、林長民等似乎就是利用省憲運動及裁兵主張這兩個題目與北大人士往還的。在此，我們要特別注意林長民的行動。林氏在進步黨中與梁啟超及湯化龍同爲三位主要領袖。湯化龍於民國五年被刺身死，進步黨中只有梁林支撑。林氏曾任北京政府司法總長等職，與梁啟超爲至交，且進而結爲兒女親家。梁啟超退隱津門，仰賴林長民周旋於北京政學兩界。林長民以胡適爲接觸對象，是否受梁啟超的指示，不得而知，在胡適的日記中，林長民頻頻出現。十一年四月間林氏便向胡氏遊說組織團體，胡適一時不知如何決定，立即以信函向蔡元培請示，他給蔡的信說：

「林宗孟〔林長民〕數日前來訪，說他要與亮疇〔王寵惠〕、鈞任〔羅文幹〕及先生等組織一種研究政治社會狀況的團體；並說君任曾以此意奉白先生。他要我也加入，我不曾答應，亦不曾拒絕，只說俟與先生一談再說。連日相見，皆不曾有機會提及此事。故乘便一問。先生意見如何？便中幸見告㉕。

蔡元培給胡適作覆，原信說：

「知林宗孟忽有組織團體之提議，請以弟所知奉告。弟與羅鈞任在歐洲時，鈞任曾先到英國，回法後見告，謂林宗孟深以亮疇及弟不干與政治問題爲恨。有一日，在顧少川〔顧維鈞〕所邀晚餐會上，林又以此語顧，勸顧發起云云。此去年事也。最近數日前，鈞任來弟處，言彼責備亮疇，不宜太消極；宜發表對於現今各種大問題之意見；可先以一雜誌發布之，亮疇已首肯云云。因詢弟可否幫忙？弟答以可；但告以現在之大問題，莫過於裁兵理財，須有專家相助。彼提出蔣百里〔蔣方震〕，弟以百里頗有研究〔系〕色彩，不甚滿意；然以軍事家不易得，亦以爲可。其後彼又提出先生及夢麟，又曾提及顧少川，弟當然贊成。彼忽提出宗孟，弟爾時卽憶及去年之言，卽告以宗孟爲研究系頭領，恐不好拉入。彼言以人材取之，不好太取狹義。弟告以有此等頭領在內，外人卽以爲此舉全是某系作用，而以亮疇等爲傀儡，發言將不足取信。彼後言今日不過探公意思，如果能組織，自當從長計議云云。今宗孟又來拉公，可知主動者全是宗孟。亮疇是好好先生。鈞任年少而頗熱中，佩服顧少川幾乎五體投地，故有此等運動。此後如鈞任再來商量，弟當簡單謝絕之矣。」㉖

㉔ 民國十一年十月十日，蔡元培、林長民等在北京舉行裁兵運動大會，參加者八十六個團體，五萬餘人，黎元洪到場演說。（郭廷以編，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六七五。）
㉕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頁三二八。
㉖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頁三二九。原信署十一年四月廿一日。

從蔡元培的信，可以知道林長民的聯絡及組織團體的意思，年前就已經有了。北大在蔡元培的領導下，自始就是反對與研究系聯合的。

雖然如此，梁啟超、林長民並不了解這種情形，還是鍥而不捨的來拉好。十一年四月廿七日胡適的日記說：

「蔡〔元培〕先生昨夜打電話來，說宗孟、亮疇、鈞任去看過他，談過前次商議的事；蔡先生不主張組織團體，但贊成發表意見，並由一班人出來主持裁兵的事。他們要我起草作宣言，我不願作；宗孟今天要來看我，我不能在家，故乘便去看他。我說明不作宣言之故，勸他自己起草。此事終宜愼重。……」㉗

五月廿七日胡適再記：

「宗孟邀吃午飯，同坐有孑民〔蔡元培〕、汪伯唐〔大燮〕、任公〔梁啟超〕、鈞任、唐天如、張公權〔嘉璈〕等。宗孟極力勸我們出來組織一個政黨，他尤注意在我。他的語鋒尖利得很，正勸反激，句句逼人，不容易答覆。但辦黨不是我們的事，更不是我的事，人各有自知之明，何必相強，自取憤事。

「有人說我們『愛惜羽毛』，鈞任有一次說的好，『我們若不愛惜羽毛，今天還有我們說話的餘地嗎？』」㉘

胡適這時才說出他對於研究系的觀感：

「研究系近年作的事，著著失敗，故要拉我們加入。結果有兩條可能，或是我們被拖下水而於事無濟，或是我們能使國事起一個變化。若做到第二條，非我們用全副精力去幹不可。宗孟終日除了寫對聯條屏之外，別無一事；而我們已忙的連剪髮洗浴都沒工夫；在此情況之中，誰占上風，已不言而可喻了。」㉙

胡適不與梁啟超一派組黨，因素甚爲複雜。顯然的，北大人士認爲梁派不再具備政黨的實力，原先的立憲派人大都已經變成了政客㉚。氣味不投㉛，難於合作。

㉗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頁三三七。
㉘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頁三六一。
㉙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十一年四月廿七日，頁三三七～三三八。
㉚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一〇年九月二一日記：「遇著藍公武〔志先〕先生，他要我參加他們的『聯省自治』運動，我不肯加入，我雖然現在不主張放棄政治，但我不能玩這種政客的政治活動。」按藍氏爲進步黨人。
㉛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一〇年七月二一日記：「陳叔通、張東蓀邀我吃飯。東蓀與我說話時，滿臉僞氣，心不在焉，甚可怪笑。」按張氏爲上海時事新報主持人，該報爲進步黨喉舌。

其次，胡適的朋友及門生，很多人都勸胡不要與梁派人物往來，顧頡剛曾說梁啟超「他們未必盡是壞人，但他們確自有取咎之道。」㉜最重要的，恐怕還是胡適在心理上不願意與梁派人物做政治性的活動。胡適不免自認爲是新時代的人物，豈肯與一批過時了的「政客」相呼應。

胡適不願與梁、林聯合，然對於惡劣的時局仍然十分關切。他的解決時局之道，早先並不同意聯省自治一類的辦法。他認爲只要有一個好政府，什麼問題都可迎刃而解。民國十年他便有「好政府主義」的想法㉝。到了十一年五月十四日，聯合十六人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強調好政府主義。沒有邀請任何研究系人物參加㉞。

「好政府主義」宣言公布出來，梁啟超、林長民等人看了，非常失望，「大不高興」，說北大人物「有意排擠他們研究系的人。」梁啟超還很氣憤的說：「我一個人也可以發表宣言。」林長民更說：「適之我們不怪他，他是個處女，不願意同我們做過妓女的人往來。但蔡〔元培〕先生素來是兼收並蓄的，何以也排斥我們？」㉟

顯然梁啟超一派很不愉快。幸好北大派不曾明白表示不願意聯合，羅文幹等人又「極力排解」，說明好政府主義是「一班大學的人」的意願㊱。這樣雙方的隔閡算是沒有加深，所以以後的談話會雙方還是坐下來在一起談。梁啟超密切的注意其

㉜ 顧頡剛的信是這樣寫的：「我敢請求先生從此與梁任公、丁在君、湯爾和一班人斷絕了吧！固然他們未必盡是壞人，但他們確自有取咎之道，而且先生爲了他們犧牲的名譽這樣多，在友誼上也對得起他們了。」（胡適來往書信選），上，頁四三一。
另外，傅斯年給胡適的信說：「我閒暇或把梁任公的『清代學術思想史』批評……因爲他那部書太糟，就是梁氏太無學問，只以滑頭的手段去作著述家，要知人外有人，人人不盡可欺的。胡先生，你是最拜倒這滑頭文學家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拜倒他的是什麼東西，難道是研究系的勢力麼？胡先生，雖每次寫信都直言說你們的不對，這正是願做一個君子相交以誠，不願學一個小人的巧言令色。其實我是最敬愛你的，由這個敬愛，就不得不對於你有最大的希望了。」（同上，頁一七八）。

㉝ 民國十年時胡適反對人談無政府主義，主張好政府主義。他說：「我們應談有政府主義，應談好政府主義。」見胡適的日記（中華本），十年六月十八日，頁一〇〇。

㉞ 簽署的名單是這樣排列的：

蔡元培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王寵惠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羅文幹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湯爾和	醫學博士
陶行知	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國立東南大學法政經濟科主任
梁漱溟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李大釗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
朱經農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張慰慈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高一涵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徐寶璜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王　徵	美國新銀行團秘書
丁文江	前地質調查所所長
胡　適	國立北京大學教務長

（見努力週報，第二號）

㉟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十一年五月十四日。

㊱ 同上。

發展，叫蔣方震、張嘉森等人去參加，要他們報告談話會的內容和氣氛。六月間，蔣方震致梁一函，指出談話會走的是「第三條路」。㊲所謂第三條路，蓋爲一條獨立自主的路。民國以來，國內形勢，大體分爲激進的國民黨與緩進的進步黨，北大人物不與這兩黨聯合，當然自立門戶。

情勢的發展使梁啟超、林長民等甚爲失望，但是他們並不因此而灰心，既然談話會的形式還存在著，應該繼續參加活動。根據胡適的日記，十一年九月下旬的一次聚會，有蔡元培、王寵惠、顧維鈞、李煜瀛、林長民、蔣百里等人㊳。林、蔣代表研究系。這時候的好人政府已經開鑼，當初簽名的十六人當中三人入閣，王寵惠任內閣總理，羅文幹任財政、湯爾和任教育。對此，研究系表現得落落大方，精神上表示支持，與北大人士一致。羅文幹被捕時，梁啟超還打電報要求釋放㊴。

談話會繼續維持不斷，據胡適的日記，十四年一月間的一次聚會，林長民還是活躍其間㊵。北京的善後會議，林長民與胡適都參加會議，頗有週旋。這時候傳說林長民要組織一個大政黨，定名爲中華聯邦黨。胡適密切注意其發展㊶，但沒有聯絡的跡象。十五年八月間，胡適表示有意組黨，且定名爲自由黨㊷。但結果兩者都未成爲事實。民國十四年多林長民死於郭松齡的軍中。梁啟超的健康急遽下落，組黨之事無從實現，研究系也就隨之煙消雲散。梁胡在政治上終於沒有任何結合的成果。

(四)

胡梁在政治上雖然沒有結合，但在學術上卻有許多往還。前文曾經提到胡適因爲受梁啟超的影響，所以走向中國哲學思想史的研究。實際上，不僅止是梁影響胡，胡反過來也影響梁。梁啟超從政壇上退了下來，再度拾起學術性的工作，自認其個人治中國歷史的成就不讓於人，往往以先進自居，坊間有什麼新的著作出現，一時興起，立卽發表評論。他自己的治學興趣也很高，不時推出自認有心得的著作。二十年前是言論界的驕子，而今要做學術界的祭酒。而胡適從美國得了博士學

㊲ 丁編，梁譜，頁六一八。
㊳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頁四六九。
㊴ 「丁文江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一九八三年），上册，頁五三二。
㊵ 胡適日記（微捲），十四年一月十九日。
㊶ 同上，十四年一月十六日
㊷ 胡適，遊歐日記（微捲），十五年八月三日。民國十五年胡適遊歐洲，因爲在俄國與共產黨人蔡和森辯論，他有心從事政治活動，要組一自由黨，他所擬的黨綱：一、有計劃的政治；二、文官考試法的實行；三、用有限制的外國投資來充分發展中國的交通和實業；四、實行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

位歸來，立卽被聘爲北京大學敎授，五四運動一舉成名，光彩奪目，聲勢更是不讓他人，加上年輕氣盛，政治上要爭取發言權，學術上要獨樹一幟，不僅推出自己的文章，同時還要批評他人的著作。胡梁的聲勢相映，一時形成北方學術界的雙雄，誰也不願對方的聲光淹蓋了自己。胡梁在學術上常有對壘的情況發生。

最先，胡適對梁啟超頗爲敵視。民國九年至十年之際，胡與陳獨秀等一批「新青年」的朋友在一起，他們那種「革命」的氣勢，對稍具保守性格的人雖不一定採取攻勢，但處處防禦他人，且有過於防禦的心理，下面所引胡適給陳獨秀的一封信，透露了胡適的心態，也可以見出他對梁啟超的不友善：

「你難道不知我們在北京時時刻刻在敵人包圍之中？你難道不知他們辦共學社是在「世界叢書」之後，他們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們拉出他們的領袖來「講學」——講中國哲學史——是專對我們的。（他在淸華的講義無處不是尋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書之處，從不說一聲；他有可以駁我的地方，決不放過！但此事我很歡迎。因爲他這樣做去，于我旣無害而且總有點進益的。）你難道不知他們現在已收回從前主張白話詩文的主張？你難道不知延聘羅素、倭鏗等人的歷史？（我曾宣言，若倭鏗來，他每有一次演說，我們當有一次駁論。）」㊸

這封信有一些地方需要說明。第一句話所指的敵人，就是梁啟超派人物。梁啟超民國九年從歐洲回來，便創辦共學社和講學社，這是梁派力圖振作的兩個做法。共學社是以「培養新人才，宣傳新文化，開拓新政治」爲宗旨。主要的工作是編譯新書，奬勵名著，出版雜誌，選送留學生。當時胡適與陳獨秀等也有相近的想法，編譯「世界叢書」卽爲一例，所以認爲共學社的做法與他們打對臺。梁啟超等原先辦了一個雜誌，名稱叫「改造」。梁啟超從歐洲回來，將之改爲「解放與改造」，胡適認爲是與「新青年」對立的。梁啟超從民國十年秋天起四出講學，先後發表演講五十餘次，講題中當然也有中國哲學史一類的題目，胡適認爲這也是與他打對臺的。梁啟超在歐洲的時候，便決定要邀請歐洲的幾位哲學家來華講學，這時胡適等也有邀請杜威來華的計劃。雙方原先並未溝通，以爲又是打對臺。後來雙方合作，羅素、杜威等之來華，是雙方共同贊助的結果。倭鏗（或譯倭伊鏗）是德國唯心派哲學家。胡適是個實驗主義者，當然反對倭鏗㊹。

㊸ 「胡適致陳獨秀」，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册，頁一二〇～一二一。這封信大約寫于民國九年底或十年初，見原註。
㊹ 詳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第六章。

胡適這封信反應他的過份防禦，但日子久了，他發現梁啟超是一個「和藹可親，全無城府」的人㊺，他改變了對梁的印象，他依然對梁的作品有好感，學術上儘可以有不同的見解，但不足以形成敵對或敵視。眞理愈辯愈明，不如提出來公開討論，這才是爲學之道。胡梁的關係因此改善。隨著就展開了學術上的往來。

胡適與梁啟超在學術上的第一回合往來，是關於梁之「清代學術概論」一書。按此書之著，原意是給蔣方震的「歐洲文藝復興史」寫一篇序文，梁認爲歐洲在十六世紀有文藝復興，中國清朝的「考證學」與「今文學」也可以算作文藝復興，因此便將清朝的學術發展作一概述。不料下筆即如行雲流水，不數日而成一洋洋灑灑的巨著，數量與蔣方震的歐洲文藝復興史相埒，只好獨立成書㊻。梁啟超所以有這樣的衝動，胡適的鼓勵有部份關係。梁氏在自序中說：「胡適語我，晚清『今文學運動』，於思想界影響至大，吾子實躬與其役者，宜有以記之。」㊼由於這種關係，梁氏的書寫成之後，不能不讓胡適提供意見，梁氏約請胡適評論的信說：

「公前責以宜爲今文學運動之記述，歸即屬稿，通論清代學術，正宜鈔一副本，專乞評隲。得百里書，知公已見矣。關於此問題資料，公所知當比我尤多，見解亦必多獨到處，極欲得公一長函，（原注：亦以此要求百里）爲之批評，既以稗益，且使讀者增一層興味，若公病體未平復，則不敢請，倘可以從事筆墨，望弗吝教。超對於白話詩問題，稍有意見，頃正作一文，二、三日內可成，亦欲與公上下其議論。對於公之哲學史綱，欲批評者甚多，稍間當鼓勇致公一長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筆不能自休耳。（民國九年十月十八日與適之老兄書）」㊽

胡適在日記中曾經兩度提到清代學術概論，第一次是在民國十年五月二日該書出版後不久，他說：

「車中讀梁任公先生的清代學術概論。此書的原稿，我先見過，當時曾把我的意見寫給任公，後來任公略有所補正，『改造』登出之稿之後半已與原稿不同，此次付印，另加惠棟一章，戴氏後學一章，章炳麟一章，原稿皆無。此外，如毛西河一節，略有褒辭；袁牧一節全刪，姚際恒與崔適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見。

㊺ 胡適日記（微捲），十八年一月二十日。
㊻ 「蔣方震序」，清代學術概論，（臺北，中華，民四七年）頁一。
㊼ 「自序」，清代學術概論，頁三。
㊽ 丁編，梁譜，頁五九〇。

任公此書甚好，今日亦只有他能作這樣聰明的著述。此書亦有短處，他日當爲作一評，評其得失。」㊾

我不知道胡適後來是否有公開的書評。但所謂中國的文藝復興，胡適認爲梁氏並無定見。清末梁氏在「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本來對清代的學術甚爲推崇，頗有意以之爲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他在第八章中這樣說：

「有清二百餘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餘年之學術，倒捲而繅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裏；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此現象誰造之，曰社會周遭種種因緣造之……要而論之，此二百年間，總可命名爲古學復興時代。」㊿

這篇文章之作，正當梁氏的激進時代。及至梁氏一九〇三年轉變之後，不再多談破壞冒險的話，進而提倡個人道德規範，大倡宋明理學中的德性修養。新民說的私德篇指責漢學潮流，如謂：

「夫宋明之學，曷嘗無缺點之可指責？顧吾獨不許鹵莽滅裂之漢學家容其喙也。彼漢學則何所謂學？——吾見夫本朝二百年來學者之所學，皆牛鬼蛇神類耳。」51

又說：

「若漢學者，則立于人間社會以外，而與二千年前地下之僵石爲伍。雖著述累百卷，而決無一傷時之語；雖辯論千萬言，而皆非出本心之談，……於是名節閑檢，蕩然無所復顧。故宋學之敝，猶有僞善者流，漢學之敝，則並其僞而亦無之……漢學者，率天下而心死也。此等謬種與八股同毒，盤踞于二百餘年學界之中心，直至甲午（一八九四）、乙未（一八九五）以後而其氣燄始衰。而此不痛不癢之世界既已造成，而今正食其報，耗矣哀哉！」52

梁將清朝的漢學地位降低了。胡適對於新民說中的這兩段話大不以爲然，曾在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的日記中引出，加以指責。胡適的觀點一則是反對宋明理學，再則也是漢學與他的實驗主義信仰頗有關係之故。

胡適不僅肯定清朝的漢學有如西方的文藝復興，而且視五四運動爲文藝復興的高潮。他不願有人輕視清朝的漢學，進而反對砭低五四的地位。有一次丁文江說，

㊾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十年五月二日，頁三六。圓點是著者加上的。
㊿ 「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新民叢報，五十八號。又見中華書局本（民五六年）頁一〇二～一〇三。
51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原出新民說（臺灣中華本），頁一二六。
52 同上，頁一二六～一二七。

中國的文藝復興「應如梁任公所說，只限於清代的漢學，不當包括近年〔五四〕的文字革命運動。」胡適便說：「我反對此說。」㊸大不謂然。

五四時期胡適等提倡漢學，梁啟超與時俱進，隨著改變，又把原先在「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中刪去的一段文字引出㊹，胡適因而譏諷梁氏，謂：「近年因爲我們把漢學抬出來，他〔梁〕就也引他那已刪之文來自誇了。」㊺這是一段很有趣味的故事，證明梁氏善變，亦可見梁頗受胡的影響。

胡適與梁啟超學術上的第二回合往還，是墨子之學。胡適之認識梁啟超是藉向梁請教墨學的機會，但反過來，梁甚佩服胡的墨學成就，以致有日後的往還。梁啟超早在一九〇四年便對墨學的思想發生興趣，曾著「子墨子學說」一書，就是這本書，使胡適說梁啟超對墨子有研究，對他有影響。民國十一年胡適說：

「梁先生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學說了，他在新民叢報裏曾有許多關於墨子的文章，在當時曾引起了許多人的興趣，我自己便是那許多人中的一個」㊻。事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梁啟超反過來說胡適對墨子有新的見解，把自己原有的一些觀念，加上胡適在哲學史大綱中的見解合成「墨子學案」，在序文中很坦白的說：「胡君適之治墨有心得，其中國哲學史大綱關於墨學多創見，本書第七章多採用其說。」檢視「墨子學案」一書，共計六萬字，第七章將近三萬字，可見梁確實受胡適的影響。公平的說，早期是梁影響胡，後期是胡影響了梁。梁胡對於墨子的興趣不減，民國十年胡著「墨辯新詁」，十二年梁著「墨經校釋」，互相參證，互相辯論。胡適十年二月廿九的日記說：「梁先生還我『墨辯新詁』三册，另有兩書，與我有所辯論。」㊼梁啟超給胡適的信，稱道胡治墨經有「極肫篤的學者態度」，「於學風大有所裨。」「獨到處殊多可佩，」㊽當然也表示了一些自己的見解。

胡梁之間的墨學往來，雖然彼此稱道，卻也有一些小小的不愉快。梁啟超著成「墨經校釋」之後，曾經請胡適寫序，胡適很高興的寫了一篇四五千字的序，說梁著「很有許多新穎的校改」，當然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見。梁啟超對於胡適的序

㊸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十一年二月十五日，頁二六七。
㊹ 見清代學術概論（臺北，中華，民五五年）「自序」
㊺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十一年二月十五日，頁二六七。按早期「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曾有刪節。
㊻ 胡適，「墨經校釋後序」，載梁啓超，墨經校釋（臺北，中華，民五七年），頁九九。
㊼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頁二七。
㊽ 墨經校釋，「讀墨經餘記」，頁一〇、一三。

文又作了一這答辯。及至十一年「墨經校釋」出版，梁將自己的答辯書放在前面，把胡適的序置於後面。胡適看了，很不高興，他在十一年四月三十日的日記中說：

「梁任公的『墨經校釋』出來了。他把我的序放在書末，卻把他答我的序的書稿放在前面，未免太可笑了。」㊾

胡適對於此事耿耿於懷，事隔多年之後，他在日記中再度提起說：

「以『墨經校釋』事而論，我因他虛懷求序，不敢不以誠懇的討論報他厚意，故有點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錯誤。但這態度非舊學者所能了解，故他當時不免介意。我當時也有點介意。但後來我很原諒他。」㊿

胡梁的第三個回合是梁氏論評胡氏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前文指出，胡適之有研究中國學術史的興趣，是受了梁啟超的影響，「中國哲學史大綱」就是這個影響下的產物。中國哲學史大綱在民國八年出版，轟動一時，兩個月就再版了，大有洛陽紙貴之勢。這是一本運用西洋治學方法寫成的中國哲學史，學界無人不加以重視。但是胡適對於中國古聖先賢的許多解釋，不無見仁見智之處，自然引起了許多爭議。三年之後，該書仍然是學界中的熱門話題。北京大學哲學社決定邀請梁啟超做一次公開的演講，專門評論這本「一字千金」的名著。一般人都認為只有梁啟超夠資格評論這一本書，梁氏也就當仁不讓了。

梁評胡著一共講了兩天，時在民國十一年三月四、五兩日。梁啟超以兩天的工夫才說完他對胡著的意見，可謂慎重其事。這一篇書評收在飲冰室文集中，長達一萬三千餘字(61)。據說，兩天的聽眾座無虛席，事前報紙上有一段啟事，要前往聽講的人先購一本胡著帶著，因此北京商務印書館的存書頓售一空，求諸各分館亦不足數(62)。

梁氏採用先稱讚後批評的方式來評論，一開始就指出：

「這書處處表現出著作人的個性，他那銳敏的觀察力，緻密的組織力，大膽的創造力，都是『不廢江河萬古流』的。」(63)

可謂十分稱道，但是梁氏的批評則是非常嚴厲的。他說：

「這部書講墨子、荀子最好，講孔子、莊子最不好。」(64)

㊾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頁三四五。
㊿ 胡適日記（微捲），十八年一月二十日。
(61)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臺北，中華，民五七年），之三十八，頁五一～六八。
(62) 李敖，胡適研究（臺北，文星，民五三年），頁二一九。
(63) 飲冰室文集之三十八，頁五一。
(64) 同上，頁六〇。

又說：

「總說一句，凡關於知識論方面，到處發見石破天驚的偉論；凡關於宇宙人生觀方面，什有九很淺薄或謬誤。」⑥⑤

梁指出全書兩個缺點：

「第一個缺點，是把思想的來源抹殺得太過了；第二個缺點是寫時代背景太不對了。」⑥⑥

書評還指胡適太時髦。順著又指責胡不該說「打倒孔家店」的話：

「時髦氣未免太重些，有時投合社會淺薄心理，順嘴說句把俏皮話！我還記得胡適文存裏頭有一篇說什麼『打倒孔家店』的話，我以爲這種閑言語以少講爲是。」⑥⑦

梁啟超的批評是不留餘地的。胡適聽了當然非常不高興，我們來看看他在日記中的反應：

「昨天哲學社請梁任公講演，題爲『評胡適的「哲學史大綱」』，借第三院大禮堂爲會場。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本可以不去睬他。但同事張競生教授今天勸我去到會，——因爲他連講兩天，——我仔細一想，就到會了，索性自己去介紹他。他講了兩點多鐘；講完了我又說了幾句話閉會。這也是平常的事，但在大眾的心裏，竟是一齣合串好戲了。

他今天批評我講孔子、莊子的不當。然而他說孔子與莊子的理想境界都是『天地與我併生，而萬物與我爲一』，不過他們實現這境界的方法不同罷了！這種見解，未免太奇特了！他又說，莊子認宇宙爲靜的！這話更奇了。

他講孔子，完全是衞道的話，使我大失望。

我閉會的演說，先謝他的批評，次說中國哲學史正在草創時期，觀點不嫌多；次用西洋哲學史上 Plato 爲例，說述學之不容易；次舉他的幾點貢獻，——如古代哲學衰亡的原因（除我的四個之外），一爲秦漢之際思想由奔湍變爲大湖泊，一爲平原民族性愛中庸而厭極端，——次說他說的『觀點不同』的話之不錯。在這一段中，我說：

歐洲中古時代，教會中討論一個神學問題時，於護法的主張之外，常設一個『魔鬼的辯護士（advocatus diaboli）』代表反對的論調。平常人所認爲黑

⑥⑤ 同上。
⑥⑥ 飲冰室文集之三十八，頁五四。
⑥⑦ 同上，頁六四。

暗的中古歐洲，尙能不抹煞反對的論調，何況我們今日呢？因此，我覺得孔子的學說受了二千年的尊崇，有了那麼多的護法神了，這個時候，我來做一個小小的 advocatus diaboli，大概總還可以罷？我又覺得莊子的話，——『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爲害不淺，致使中國兩千年沒有一個爲思想爲眞理爲宗教而死的人；莊子的書，受了兩千年的盲從，——大家都覺得他『說不出個所以然』的好！——替他辯護的人也够多了，我來做一個小小的 advocatus diaboli，大概也還可以罷？

末段我申明『觀點不同』之說：

梁先生常說我的時代觀念太分明了。這一點我不但不諱，還常常自誇。我這部書的特點，一是時代分明，二是宗派分明。我決不會把孔子、莊子說成有同樣的主張，同樣主張『萬物與我併生而天地與我爲一』！

但是這種不同觀點都是好的。我希望多得許多不同的觀點，再希望將來的學者多加考慮的工夫，使中國哲學史不致被一二人的偏見遮蔽了。梁先生今天的教訓就使我們知道哲學史上學派的解釋是可以有種種不同的觀點的。」⑱

可見胡適內心的反應相當強烈，雖然表面上他好像與梁串演了一齣好戲⑲。不過胡適還是很有理性，第二天經過一番反省之後，他認爲梁氏所說「老子」一書是戰國之末的作品「有討論的價值」，他在日記中記下了梁的六點理由，也提出了六點不同的見解⑳。

胡梁的第四個回合是梁評論胡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胡適在民國十二年應清華學校學生胡敦元等四人之請，擬定一個書目，以備他們出國留學時仍能讀到一些必須的國學著作。這一個書目，計包括工具之部，思想之部及文化學之部三類，列舉一百七十餘種著作，梁啟超看了大不以爲然，著「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梁氏一開始就說：「胡君這書目我是不贊成的。因爲他文不對題。」又是嚴厲

---

⑱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民十一年三月五日，頁二七七～三七八。

⑲ 陳雪屏回憶當時聽講的情形說：梁任公應哲學會的邀請，到北大三院大禮堂講「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講演分爲兩天，每次約二小時左右。在第二天，胡先生也隨同坐在臺上。任公的講演經過了長時間的準備，批評都能把握重點，措辭犀利，極不客氣，却頗見風趣，引導聽眾使他們覺得任公所說很有道理。第二天留下一半的時間讓胡先生當場答辯。胡先生對第一天的講詞似乎先已看到紀錄，在短短四十分鐘內便輕鬆地將任公主要的論點一一加以批駁，使聽眾又轉而偏向於胡先生。如果用「如醉如狂」來形容當時聽眾的情緒似乎不算過。見胡頌平編，胡適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民七十三年），頁四八三。

⑳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民十一年三月六日，頁二七八～二八〇。

的開場白。接著梁說：「胡君致誤之由，第一在不顧客觀的事實，專憑自己主觀為立腳點。……胡君第二點誤處，在把應讀書和應備書混為一談。……我最詫異的，胡君為什麼把史部書一概屏絕，一張書目名字叫做『國學最低限度』，裏頭有什麼三俠五義、九命奇寃，卻沒有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豈非笑話。……若說不讀三俠五義、九命奇寃便夠不上國學最低限度，不瞞胡君說，區區小子便是沒有讀過這兩部書的人。我雖自知學問淺陋，說我連國學最低限度都沒有，我卻不服。……總而言之，胡君這書目，從一方面看，嫌他罣漏太多，從別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認為是不可用的。」㉑

這一個書評的用語也是令人驚心動魄的。我們不知道胡適對此有什麼反應，梁啟超後來發表的國學入門書目，胡氏的看法又如何？由於資料的限制，無法進一步討論。

胡梁之間學術上的切磋往還，最後一個回合是胡適評論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歷史研究法是中國新史學中的經典之作，直至今日，仍為寫歷史者的入門必讀。民國十一年此書初版發表，胡適讀後，在日記中記說：

「作書寄梁任公，指出他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裏的錯誤兩處：

(一)誤以 Herodotus 為 Homer;

(二)誤以此二人為一人。

其實他盡可以不必亂引西洋史事。然此種小疵不足以掩此書之大長處。此書可算是任公的最佳作。」㉒

以上是胡梁之間學術上往來的種種。雙方互相批評，胡適總是客客氣氣的，從來不公開說一句重話。胡適常說：「我們把梁先生看作老輩」，他是緊守著此一原則的。反過來看梁啟超，雖然他曾經稱道胡適是「績谿諸胡之後……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㉓但嚴厲的批評確實不少。胡適對梁的批評當然很不愉快，常常在日記中發洩，但絕不公開反唇相譏。老輩是老氣橫秋，晚輩卻彬彬有禮，反映出中國的優美傳統。

以上是胡梁之間純學術性的往來。接下來我們還要略為觀察胡梁之間的白話文觀點異同之處。胡適是白話文運動的領袖，凡是反對白話文的，他一定要駁斥抵

㉑ 梁啓超，「國學入門書目及其讀法」，選入嚴靈峯編，書目類編（九十四）（臺北，成文，民六五年），頁三二～三六。

㉒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十一年二月四日，頁二五五。

㉓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六。梁在「近代學風之地理分布」一書中也有相似的稱道。

抗。胡適在日記中記載，謂民國八年時梁啟超反對過他的白話文運動㊹。他言之鑿鑿的說，民國八年他們在白話文上有不同的意見㊺，又說梁反對白話詩，如謂：

「梁任公有一篇大駁白話詩的文章，尚未發表，曾把稿子給我看，我逐條駁了，送還他，告訴他『這些問題我們這三年〔一九一八～一九二一〕都討論過了。我很不願他來舊事重提，勢必又引起我們許多無謂的筆墨官司』，他才不發表了。」㊻

梁氏對於白話詩確實有意見，下文當詳述。但對於白話文是否與胡適有不同的看法，則因資料缺乏，無從證明。仔細檢查梁氏的思想，他在戊戌變法時期便已注意到了言文分離的毛病。他在「變法通議：論學校」一文中便這樣說：「古之人言即文也，文即言也。自後世語言文學分，始有離言而以文稱者。然必言之能達，而後文之能成，有固然矣。」㊼既然如此，胡適提倡言文一致，梁氏是不會反對的。事實上梁於民國六年四月間在北京教育部演講，又再度言及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碍科學進步。根據時報的記載是這樣的：

「梁任公先生前在教育部演說中國教育之前途與教育家之自覺，其第四點云：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學之進步也。以中國現在之文字，學現在世界之科學，欲其進步，殆絕不可能之事，非以其煩難也。以中國之字，常用者不過數千，原不為難，難者其文法之組織耳，語言與文字分而為二，其結果自不得不為紙的學問。蓋吾國之文字，乃古時之文字，惟宜對古人用之，不宜用以求今之科學也。歐美各國，亦有古文今文兩種，古文惟用於經典，研究科學，絕不用之。即如德國科學之進步，不過百年間事，其學問所以如此發達者，實因國語獨立，故我國教育各種科學，必用古之文字，是為國語之不獨立，是為對古人之不獨立，講來講去，皆古來學問，非現在之學問，無怪教育之不能發達也。此事聞貴部久已注意，可謂卓識，然不可不乘此時機，造成一種國語，所謂國語者，非用一地方之俚語也，其程度必視尋常之語言稍高，視尋常之文字較低，將來通用於各學校，以利教育，則於科學之進步，教育之普及，均有莫大之裨益矣。從前一般教育家，深以兒童讀經為詬病，誠以六七歲之兒童，萬不能與之講經說古也。今雖易以教科書，而所用

㊹ 胡適日記（微捲），民十八年一月二十日。
㊺ 胡適日記（微捲），民十八年元月三十日。
㊻ 「胡適致陳獨秀」，胡適來往書信選，頁一二〇～一二一。
㊼ 轉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二三一、二四七～二四八。

者猶是古來文字，直五十步笑百步耳。科學之不能進步者以此，故鄙人以爲及早造成一種國語，用以編纂教科書，以利教育，誠目前非常重要之事。」⑱

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於民國六年一月一日在「新青年」二卷五號刊出。四月間梁啟超即有此演講，可說完全表示支持。民國六年，梁啟超四十四歲，雖然已經步入中年，仍然有心與時俱進，與年輕一代並駕齊驅。胡適提倡白話文，不僅與之呼應，自己更是跟著也寫白話文的文章。民國九年的「歐遊心影錄」就是一本純白話的著作。他給子女們的信函幾乎完全是白話寫的。

不僅如此，梁的詩詞也有用白話文寫的。例如民國十四年六、七月間，他寫一首詞送故人湯化龍（濟武）的兒子湯佩松出國留學，原詞送請胡適品評：

「頃爲一小詞，送故人湯濟武之子游學。（原注：此子其母先亡，一姊出家，更無兄弟，孤孑極矣。）即用公寫法，錄一通奉閱，請一評，謂尚要得否？（原注：下闋莊語太多，題目如此，無法避免，且亦皆心坎中語也。）」沁園春，送湯佩松畢業游學。「可憐！阿松：萬恨千憂，無父兒郎。記乃翁當日，一身殉國，血橫海嶠，魂戀宗邦。今忽七年，又何世界？滿眼依然鬼魅場！泉臺下，想朝朝夜夜，紅淚淋浪。松！已似我長；（適按：此四字原稿爲『軀已昂藏』）學問也爬過一道牆。念目前怎樣，腳根立定？將來怎樣，熱血輸將？從古最難，做『名父子』，松！汝嵌心謹勿忘！汝行矣！望海雲生處，老淚千行。」⑲

梁氏給老友籍忠寅（亮儕）的詞也是白話做的。也抄給胡適：

「好事近。籍亮儕病中賦詩索和，其聲哀厲，作小詞以廣之。千古妙文章，只有一篇七發。侈說『驚濤八月』，又『怪桐百尺』。『主人能強起學乎』？『憊矣』！『謹謝客』。幾句『要言妙道』，恰霍然病失。咄咄臭皮囊，偏有許多牽掣！哄動文殊大士，到維摩丈室。多生結習滿身花，天女漫饒舌。一喝耳聾之後，看有何言說？」⑳

另又抄了他悼念陳師曾的一首詞：

「江西月。癸亥端午前三日，師曾以畫扇見詒，畫一宜興茶壺，媵以小詞，

⑱ 上海時報，民國六年四月十六日，「梁任公對於語言之意見」。
⑲ 丁編，梁譜，頁六七三。
⑳ 丁編，梁譜，頁六七四。

蓋絕筆矣。檢視摩挲，追和此辭，泫然欲涕。「憶得前年此日，陳郎好畫剛成。忽然擲筆去騎鯨，撇下一壺茶冷！摘葉了無葉相；團泥那是泥形？（註一）『虛空元自沒虧盈』，註二此意乃翁能領。（註一：原詞云：摘葉何須龍井，團泥不必宜興。註二：散原先生原句。）」㉛

胡梁常有聚在一起談白話詩詞的機會。例如十一年八月二日胡適日記說：「任公邀吃飯，座有在君〔丁文江〕，我們大談詩。」㉜又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記：「梁任公謂孔雀東南飛一詩宜在六朝時，其說謂此受了佛家文字的影響。」㉝梁氏是同意用白話寫詩詞的。他對詩的唯一要求，必須要有韻腳，押韻是詩的一個必要條件。此與胡適的不一定講求押韻則有出入。民國十四年梁見了胡適不押韻的詩，便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給胡適的信說：

「兩詩妙絕，可算『自由的詞』。石湖詩書後那首若能第一句與第三句爲韵——第一句仄，第三句平——則更妙矣。去年八月那首『月』字和『夜』字用北京話讀來算有韵，南邊話便不叶了，（原注：廣東話更遠）念起來總覺不嘴順。所以拆開都是好句，合誦便覺情味減。這是個人感覺如此，不知對不對？我雖不敢說無韵的詩絕對不能成立，但終覺其不能移我情。韵固不必拘定什麼佩文齋詩韵、詞林正韻等，但取用普通話念去合腔便好。句中插韵固然更好，但句末總須有韻，（自然非句句之末，隔三幾句不妨）若句末爲語助詞，則韻挪上一字，（如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我總盼望詩在這種形式下發展。」㉞

總而言之，梁啟超絕對不反對白話文運動，要之僅是白話詩詞有無韻腳的問題。但這是形式，與白話是沒有關係的。胡適的白話文運動的成功，梁啟超的支持似乎多少有些關係。

(五)

以上的敍述和討論，包括胡適與梁啟超在學術上和政治上的一些見解和接觸。除此之外，他們在生活中也有一些往還。他們不時有聚在一起飲宴聊天，乃至於遊山玩水的機會。胡適是以晚輩的態度事梁，梁也就毫不客氣的以長者自居。胡適曾

㉛ 同上。
㉜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頁四一六。
㉝ 胡適日記（微捲），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㉞ 丁編，梁譜，頁六七五～六七六。

經這樣說：「任公先生是前輩，比我大十八歲，他雖然是十分和易近人，我們總把他當著一位老輩看待。」㊵有一些場合，他們邀請梁出來主持，有時引他的話作座右銘。舉例來說，徐志摩與陸小曼的婚姻是由梁證婚的。但此事梁「極不願意」，因爲他認爲「徐、陸的婚姻是極不道德的」。但胡適苦苦爲徐志摩說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請。」㊶胡適一度「頗愛喝酒」，丁文江勸胡不可過於愛好杯中物，特別把胡適「嘗試集」中的「朋友篇」詩句摘出數句來，請梁啟超寫在扇子上，要胡適戒酒。丁胡是好朋友，他們希望用梁的法書，胡適自己的話作爲警戒，不再多飲酒㊷。

這一類的往來，日子久了，大家更爲互相了解，友誼更爲增進。從民國十二三年之後，直至民國十八年梁氏過世，這五六年間，他們的交往最爲密切。不幸梁氏的健康在民國十一年以後便趨於衰退，十四年之後發生血尿，終於十八年元月逝世。梁氏得病之後，胡適時時以信函問候。他有一段時間在上海生活，每有朋友自北京來，即問起梁的健康狀況，且在日記中記下感懷。十七年十一月一日記：

「〔徐〕新六說梁任公先生病不好，今日得蹇季常電，說他病重，我同新六都很感觸」㊸

十八年元月十九日梁氏過世的那天，胡適正好從上海抵北京，他想能與梁氏見最後一面，但梁於八小時前已經化去。胡適在日記中寫道：

「晚九點多鐘到北京，〔任〕叔永與白敦庸君來接。到了叔永家中，抬頭見梁任公先生寫的一副對子，我問任公病如何？叔永說『你也許見得着他』。殊不料任公此時已死了八點鐘了。他是這一天下午兩點一刻死的，叔永還不知道，我們到次日看報才知道。」㊹

梁氏死後，胡適很難過，第二天去參加大殮，爲之流淚。他的日記說：

「今日任公大殮，在廣慧寺。我同〔任〕叔永、陳寅恪、周寄梅〔詒春〕去送他入殮，第一個見著蹇季常，他兩眼噙着老淚，我說：『我趕來遲了八點鐘！』也不覺墜淚了！……有許多任公舊友下淚的。」㊺

梁氏是在協和醫院病逝的。二十年後，胡適說：「世界最新最完備的一個醫院，竟

㊵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三二。
㊶ 丁編，梁譜，頁七一〇。
㊷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三二～三三。
㊸ 胡適日記（微捲），十七年十二月一日。
㊹ 胡適日記（微捲），十八年一月十九日。
㊺ 同上，十八年一月二十日。在胡適序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有相同的記載。

無法延長一位平日體格很強，生龍活虎一般的大人物的壽命。」⑨¹他惋惜梁氏的早死。

胡適在他的日記中給了梁啟超最後的評論。第一是梁氏的爲人，他說：「任公爲人最和藹可愛，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人家說他是陰謀家，眞是恰得其反。」⑨²胡適以他們學術上的往還來證明梁氏的爲人：

「他對我雖有時稍露一點點爭勝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話文，如在北大公開講演批評我的哲學史，如請我作墨經校釋序而移作後序，把他的答書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辯。但這都表示他的天眞爛漫，全無掩飾，不是他的短處，正是可愛之處。近年他對我很好，可惜我近年沒多機會多同他談談。」⑨³

第二是胡對梁的成就與影響的評論。梁氏死後，胡適作了一副輓聯：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許，中國新民。」⑨⁴

胡對這副輓聯有所解釋，也可以說就是他對梁的評價。

「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統系的訓練，好學而不得良師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響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幾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傳世不朽者何在，頗難指名一篇一書。後來我得結論是他的『新民說』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貢獻。新民說篇篇指摘中國文化的缺點，頌揚西洋的美德〔是〕可給我國人取法的，這是他最不朽的功績。故我的輓聯指出他『中國之新民』的志願。」⑨⁵

胡適的這個定評，有其一貫性。早在民國十二年時，他就指出「時務報」、「新民叢報」和「新青年」，是戊戌至五四的三個最具影響力的雜誌：

「〔從一八九八至一九二三〕二十五年〔之間〕只有三個雜誌可以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是創造了三個新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而『民報』與『甲寅』還算不上。」⑨⁶

三個有名的雜誌，梁氏主持的有其二。胡在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日記中說：「翻看梁任公全集，其中也很有可細讀之作。」⑨⁷可見胡的觀點沒有改變。

---

⑨¹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七四。
⑨² 胡適日記（微捲），十八年一月二十日。
⑨³ 同上。
⑨⁴ 同上，十八年二月二日。
⑨⁵ 胡適日記（微捲），十八年二月二日。
⑨⁶ 「胡適致高一涵」，胡適來往信函選，頁二一五。
⑨⁷ 胡適日記（微捲），十一年十二月十日。胡適計算梁氏一生的著作，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偶然計算梁任公先生乙丑（一九二五）編本飲冰室文集有多少字數。共八十本，每本平均六十三頁，每頁八三二字，每本約五二、〇〇〇字，全書約四、一六〇、〇〇〇字。此外尚有許多整部的書，合計約六百萬字。」見胡適日記（微捲），十八年三月十七日。

胡適認爲梁啟超的貢獻，是他的「自責主義」。用今天的辭彙來說，就是批評傳統與要求改革。梁因批評傳統而使中國向前邁進。民國二十四年胡適致陶希聖函云：

「你試看看這三十五年的歷史，還是梁任公、胡適的自責主義發生了社會改革的影響大呢？還是那些高談國粹主義的人們發生的影響大呢？」⑱

胡適認爲他與梁啟超一樣，也是一個「自責主義者」，他們推動了中國向前的腳步。

胡適又認爲「從梁啟超到新青年」（或從梁啟超到胡適）有似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一八三七～一九〇一）是「側重個人解放」的時代。換而言之，梁胡是中國個人主義解放的運動者。胡適很感慨這個解放運動未能繼續，民國十二年以後，便轉入了集體主義的時代，「無論爲民族主義運動或共產主義運動，皆屬於反個人主義的傾向。」⑲

胡適認爲梁啟超的成就受到限制是因爲訓練不够，除此之外，尙有其他原因：第一、梁不當放棄言論去做官。民國十一年二月間，胡適的朋友多人勸他不要辦報，如果辦報，便要「做梁任公之續。」他們以爲專心讀書是上策，做教授是中策，辦報則爲下策。胡適認爲不然。言論工作還是可以獲得進步的，而且言論是一種責任。梁啟超的問題不在辦報，而是放棄了言論去做官。他說：

「任公吃虧在放棄了他的言論事業去做總長。我可以打定主義不做官，但我不能放棄我的言論衝動。」⑳

第二，梁受一般「天資低下」朋友的影響，轉而保守，所以也限制了他的成就。胡適在日記中說：

「他〔指梁〕晚年的見解頗爲一班天資低下的人所誤，竟走上衛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發起『中國文化學院』時，曾有『大乘佛教爲人類最高的宗教，產生大乘佛教的文化爲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謬論。此皆歐陽竟無、林宰平、張君勱一班庸人誤了他。他畢竟是個聰明人，故不久即放棄此計畫。」㉑

因此胡適說，如果梁沒有晚年的「退境」，他會把輓聯改成「中國新民，生平宏願；神州革命，文字奇功。」㉒

---

⑱ 胡適信稿（夾在日記中），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
⑲ 胡適日記（微捲），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⑳ 胡適的日記（中華本），十一年、二月六日，頁二六二。
㉑ 胡適日記（微捲），十八年二月二日。
㉒ 同上。

(六)

以上所述，著重在胡適與梁啟超三方面的關係：第一是政治上的接觸，第二是學術上的見解，第三是彼此的友誼。政治方面，當胡適還是一個青少年的時候，梁啟超已經名滿天下，在胡適的心目中是一個英雄人物。直到完成留學歸國，胡適認為國家大任只有梁啟超一型的人物有資格承擔。但五四運動使胡適「爆得大名」，他的觀念有了改變。雖沒有捨我其誰的氣概，但肯定梁派已經「過氣」，不願在政治上與之結合。學術方面，胡適從知道天地間有所謂學問開始，便對梁啟超十分崇拜，他之所以走向學術思想的研究，可以說是受了梁啟超的啟發。但是後來他們的學術境界不同，見解不同，彼此常有爭論而甚至引起不快，但胡梁之間的友誼始終是正面的發展，胡適視梁為「老輩」，備至尊敬。梁氏過世之後，胡適十分悲悼，數十年之後，仍然追念不已。這是我們所得的綜合印象。

胡梁之間這三方面的關係，如果稍作進一步的觀察，或許會發現更深一層的意義。政治上梁啟超想拉攏胡適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力圖振作，正在「招兵買馬」，胡適這樣的新秀是任何政治組織所不能放過的。然而五四以後的胡適，聲譽隆起，身價百倍，他是不願輕易投入任何一個陣營的。胡適當然有自己的政治見解。從進步黨、國民黨以至於共產黨，恐怕都不在他的眼下。他一生沒有下海做政黨黨員，一則是他有自己的理想，再則與他的個性似乎有關。胡適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個性，在此無法討論，但其嚮往美國的民主政治則甚顯然⑩。國內的政治集團，有政黨之名而無政黨之實，各黨的意識型態更是叫人難於滿意。胡適拒絕了梁啟超與林長民，已決定了他日後之不願捲入其他任何政治集團。胡適很想從北大圈子中發展出一個新的胚胎。然而知識分子間的分歧，胡適是可以體會的。加上一個從事學術工作者的興趣在故紙堆中，只有在衝動的情緒下，寫寫時論性的文章，聊以滿足自己的政治興趣。

學術上胡適的治學興趣既受梁啟超的影響，日後之敢於分庭抗禮，這完全是學術代溝的關係。梁啟超是中國新史學的開山祖師，這是不容否認的。但學術的進步，日新月異。胡適從美國回來，帶來了杜威的實驗主義，在方法上已經超越了梁

⑩ 有關胡適的政治思想可參考。Min-chih Chou, *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4); Jerome 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氏。胡適說梁啟超缺乏「統系的訓練」，或許指的就是搜求證據工夫之不足。如然，這是一針見血的批評。梁氏的學問，博學有餘而系統不足，往往七分證據便說了八分話。這不是他有意如此，而是方法上的無從兼顧。由於證據搜求的不足，往往論證就受到了限制。一言以蔽之，胡梁之間在學術上是兩代人物，從方法上就可以看出。然而論學術的發展，必先有前代的歷練，然後有新生代的繼起。梁啟超可以說是上一代，胡適可以說是新生代，學術在演進中，兩代之間當然不免於分歧。

胡氏在治學方法上超越了梁氏，而梁氏並沒有這一種感覺。梁啟超從二十四歲就名震全國，不免自認智慧過人，加上不斷求變的興趣，未嘗久與學術脫節。雖然曾經兩度做官，爲時甚爲短暫，還以爲自己是學術界的執牛耳者。因此，當他批評與他相似早年得志的青年學者胡適時，才會那麼老氣橫秋，不留餘地。然而胡適是留學回來的，有博士學位，提倡文學革命，同樣站在時代的尖端，受到了批評，當然是會生氣的。但究竟胡氏接受過傳統的洗禮，不忘長幼有序的舊規範，無論他如何生氣，如何不滿於梁的批評。只能在日記中流露自己的感情，在公開場合，絕不反唇相譏。胡適不僅不與梁氏爭論，更是牢牢記住梁氏啟發他的恩惠，以晚輩待梁，他們之間有著一份深摯的友誼，使胡適久久不能忘記。

胡梁的交往關係，可以說是兩代知識分子的選例。他們二人有許多相同的地方，例如高度的智慧，早年得志，以言論起家，著作等身，時論性及學術性的著作都很豐富，對政治有濃厚的興趣，尤其以批評的態度處之。兩人也有許多不同之處，最明顯的是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同。梁啟超生長在中國轉型的初期，他從傳敎士的文章和翻譯的西書，就得到了「足够」的知識，就可以走在時代的尖端，以一隻常帶感情之筆，就可以做言論界的驕子——掀起了求變思想的狂潮。胡適十八年之後進入這一個潮流，他更容易推動這一個求變的巨輪。但是後來者需要更多的條件，正好胡適是歐美回國的留學生，所以在他領導下的求變運動更具狂飈的意味。結果梁啟超被拋擲在後面，胡適顯得更爲突出。這正是「長江後浪推前浪」的寫照。然而我們不可忘了梁已完成先驅者的使命。

梁啟超與胡適的關係，應該可以認作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承先啟後範例。梁胡相同之處，是中國知識分子應該具備的條件，不同之處正可見出時代在迅速的蛻變中。